

## 中国古代疫病观对日本的影响

浙江工商大学 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 姚 琼

**[摘要]** 古代日本关于疫病产生的根源先后出现过“天行疫”和“时行疫”的观念,这两种疫病观无论是在出现的时间上,还是指代的疫病范围上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古代日本这两种疫病观的差异性与其吸收古代中国疫病观的方式有关。日本“天行疫”、“时行疫”的观念是在吸收中国“天行疫”、“时行疫”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然而这种疫病观的吸收并不是全盘吸收的,而是有选择、区别地融入了日本的灾异思想。这也是日本“天行疫”和“时行疫”在形成过程中产生差异性的原因。

**[关键词]** 天行疫 时行疫 天命思想 灾异思想

探寻古人对疫病产生根源的看法,即疫病观,是我们了解古代社会思想的手段之一。古代日本文献对疫病的表述有“疫气”“疫病”“疫疾”“天行”“时行”,其中“天行”和“时行”不仅是对疫病的指代,还是对疫病观的一种反映。9世纪中期,日本出现过用“天行”指代疫病的记载,进入10世纪,在贵族日记中开始出现用“时行”指代疫病的记载,这两种对疫病的指代反映出当时日本对疫病产生根源的看法。本文将两种疫病观分别称为“天行疫”和“时行疫”,将通过“天行疫”和“时行疫”相关史料的梳理考察古代日本疫病观的形成、发展和特征。

### 1 古代日本“天行疫”

平安时代的史料中出现有用“天行”指代疫病的事例,本文将这类疫病称为“天行疫”。根据笔者的考察,共找到7例“天行疫”的事例,现列举如下。最早关于“天行疫”的事例可见《续日本后纪》中承和9年(842)3月15日条。

(1)“若非攘未然,恐班蒔失时,宜仰五畿内七道诸国,简修行不退者二十人,于国分寺,三个日

间,昼读金刚般若经,夜修药师悔过,修善之比,禁止杀生。佛僧布施以正税充之。若有天行之处,国司到境下,令防祭疫神,精进斋戒,共祷丰稔。”<sup>[1]</sup>这条记载记录的是承和9年(842)3月,因连日干旱,为防止疫病流行,仁明天皇于15日令诸国僧人白日于国分寺读经,夜晚则修药师悔过,并禁止杀生,如若出现“天行之处”则国司需到境下祭疫神,并精进斋戒,这里的“天行之处”即发生疫病灾情之处。

在此之后的“天行疫”记录均来自《日本三代实录》。

(2)《日本三代实录》贞观5年(863)3月15日条,“霜降,宣诏五畿七道诸国云:迺者,阴阳寮勘奏状称,捡卜筮。今兹可有天行之疫,豫能修善,可防将来者。(中略)宜仰诸国,以安居中,讲说经王,自诏到日。”<sup>[2]</sup>平安时代,阴阳寮负责占卜天象、历法等事项,根据这条记载,贞观5年(863)3月15日,清和天皇宣旨诏书五畿七道诸国,因阴阳寮勘奏,经占卜得知可能会出现“天行之疫”的天象,因此下令诸国讲说经王,以预防疫病。

在此之后的第二年,进一步出现将“天行”等同于疫病的记录,同书贞观6年(864)11月12日条

有载。

(3)“勅命五畿内并山阳、南海两道,预镇谢疫病。兼转读般若大乘,以神祇官奏言彼诸国可有天行也。”(经济杂志社,1904:166)根据这条记载,因神祇官上奏各地出现“天行”的疫病征兆,清和天皇下令五畿内和山阳南海两道转读般若经,防止疫病的发生。

此后“天行疫”的事例集中在贞观7年至贞观15年之间。

(4)贞观7年(865)5月13条,“延僧四口于神泉苑读般若心经。又僧六口,七条大路行,分配朱雀道东西,朝夕二时读般若心经。夜令佐比寺僧惠照,修疫神祭,以防灾疫。预仰左右京职,令东西九个条男女人别输一钱,以充僧布施供养。欲令京邑人民赖功德免天行也。”(经济杂志社,1904:181)根据这条记录,贞观7年(865)5月13日,为防灾疫朝廷采取了诸多宗教措施,包括令延历寺僧人分别于神泉苑和朱雀门东西两道读般若心经,以及修疫神祭。同时,令东西九条百姓每人向僧人布施一钱,希望用以充作功德而免受“天行”灾疫。

(5)贞观8年(866)4月18日条,“若狭国言,纳印公文库并兵库鸣,下知国司曰:今月十六日,宣告彼国,戒慎兵戎。今言,兵库自鸣,阴阳寮言,远国之人当有来投,兵乱天行,成相仍,宜益警卫兼防疫。”(经济杂志社,1904:211)这条记录记述的是贞观8年(866)4月,阴阳寮上奏清和天皇,京城屡见怪异之象唯恐邻国有兵前来窥视,应加强警卫,此日,若狭国即上奏称公文库和兵库都发出声响,因此朝廷下令若狭国戒慎兵戎。阴阳寮就此认为,恐怕是邻国有来犯,要防止兵乱和疫病的发生。

(6)贞观13年(871)12月14日条,“阴阳寮言,明年当有天行,又古老言,今年众木冬华,昔有此异,天下大疫。敕令五畿七道诸国,颁币境内诸神,于国分二寺转经,祷冥助于佛神,销凶札于未萌。”(经济杂志社,1904:348)根据这条记录,因阴阳寮上奏明年会有疫病流行,依据是今年出现众木冬天发芽,昔日曾出现过此类现象而天下出现

疫病流行的情况。因此清和天皇下令五畿七道诸国,颁币于诸神,国分二寺内转经,以求消灾。

(7)贞观15年(873)2月23日条,“阴阳寮言,今天行应慎,稼穡不登,以岁当三合也。诏五畿内七道诸国,班币境内名神,并于国分及诸定额寺,限以三日,昼则转经,夜则礼忏,薰修之间,禁断杀生。国司讲师斋洁至诚,祈佛神之冥助,消疫于未然焉。”(经济杂志社,1904:369)根据此记载,阴阳寮称今日恐有疫病流行应该谨慎,故清和天皇下令诏诸国颁币于诸神、国分寺及诸定额寺转经礼忏以消灾。

根据以上《续日本纪》和《日本三代实录》中对“天行疫”的记录,试总结日本“天行疫”发生的特点。首先,“天行疫”的记录共有7条,数量并不多,记录史料均为“六国史”,时间集中在9世纪中期。其次,“天行疫”基本都出现在天皇和朝廷的敕令中,多为由阴阳寮占卜天象发现有疫病流行的征兆,请求朝廷加以预防。进入平安时代,日本在律令体制中形成了以占卜来预知和预防灾异的系统,即“占卜一祭祀”的系统,如果由阴阳师占卜得知灾异的产生源于神灵作祟时,就需要采取一定的宗教措施,用以预防灾异的发生<sup>①</sup>。“天行疫”记录出现的9世纪中期,正是“占卜一祭祀”这一祭祀系统形成的时期。因此,当阴阳师占卜出“天行疫”的征兆时,朝廷需要采取一定的宗教措施预防疫情的发生。

## 2 古代日本“时行疫”

与“天行疫”出现数量不多,且年代较为集中的特点相比,“时行疫”的记录数量较多,主要分布在10世纪初期至11世纪初期。“时行疫”的记录主要为贵族日记,为方便对“时行疫”的相关记载进行分析,笔者根据《大日本古记录》将平安时代贵族日记中出现“时行疫”的事例整理如下页表1所示。

除了上表《大日本古记录》中“时行疫”的记载,最早将“时行”与疫病流行联系在一起的记载为《续日本纪》天平9年(737)4月19日条,“大宰管

表1 《大日本古记录》中的“时行疫”记录

时间	发病者	疫病的内容	采取措施	出典
延喜9年(909)9月3日		时行、洪水	重阳节会停	《贞信公记》1卷,16页
天历1年(947)8月18日	村上天皇	依御恼有时行气	御读经	《贞信公记》1卷,248页
永祚1年(989)6月23日	藤原忠赖	从昨夕有恼、仍令占,虐病、时行、风热相克与者	读仁王经	《小右记》1卷,187页
长和2年(1013)4月26日	亲王	日来烦时行		《小右记》4卷,15页
长和2年(1013)5月19日	东宫	有御恼气,似时行,依宜御座,入夜退出。	物忌	《御堂关日记》2卷,224页
长和4年(1015)5月20日	清源为信	初是时行,后似邪气卒		《小右记》4卷,31页
长和4年(1015)5月26日		世间时行多闻者	大赦天下	《御堂关日记》3卷,11页
长和4年(1015)7月12日	藤原资平	专非霍乱,头打身热,心神甚苦者,若是时行欤。	读经	《小右记》4卷,57页
长和4年(1015)7月13日	藤原资平	似时行、有时行气		《小右记》4卷,58页
长和4年(1015)12月12日	左大将 藤原赖通	依有时行疑	不断读经	《小右记》4卷,107页
长和4年(1015)12月12日	藤原赖通	是时行欲愈欤		《御堂关日记》3卷,36页
长和5年(1016)4月29日	左卫门督女儿	左卫门督女儿日来烦时行,今日当七日,万死一生		《小右记》4卷,183页
长和5年(1016)5月19日	藤原齐信	吉平占云,时行,轻者,今年可重慎		《小右记》4卷,200页
长和5年(1016)5月20日	藤原齐信	非时行云云		《小右记》4卷,201页
宽仁1年(1017)4月21日	上皇 三条天皇	院有御恼,是似时行		《御堂关日记》3卷,101页
宽仁1年5月25日	藤原经国	十五大寺依时行事下御读经宣旨	十五大寺读经	《御堂关日记》3卷,104页
宽仁1年7月10日	源雅通	今夜中将雅通(源)卒,时行更发云云		《小右记》4卷,207页
宽仁3年(1019)5月11日	皇后宫,重御恼	时行、邪气相交		《小右记》5卷,145页
宽仁4年(1020)7月28日	藤原朝经	烦时行		《小右记》5卷,230页
宽仁4年11月21日		近日往往时行发起		《小右记》5卷,254页
治安3年(1023)4月20日	藤原经通女房	被恼体时行		《小右记》6卷,157页
治安3年7月3日	藤原资房	恼时行者		《小右记》6卷,180页
长元1年(1028)12月22日	藤原良圆 藤原赖秀	似时疫,烦时行者		《小右记》8卷,117页

注:作者依据《大日本古记录》绘制。

内诸国,疫疮时行,百姓多死。诏,奉币于部内诸社以祈祷焉。”<sup>14</sup>然而,根据文意,这里的“时行”指的是疫病流行的含义,并非指代疫病,不属于本文所指“时行疫”。

那么,根据上表对《大日本古记录》中“时行

疫”的记载,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从“时行疫”指代的主体来看,大部分为贵族个人的疫病,然而,仍有三个“时行疫”指代全国范围疫病流行的事例。第一例记录是关白太政大臣藤原忠平所做日记《贞信公抄》延喜9年

(909)9月3日条,“于贞观寺修法始,今年有时行·洪水,仍九日节止。”<sup>[5]</sup>该条记录另有一则注释,「貞觀寺修法。疫癘洪水ニ依リ重陽節會ヲ停ム」(藤原忠平,1956:16),根据注释的内容,延喜9年(909)9月3日的贞观寺修法,因当年的疫疠和洪水,暂停举行重阳节会。结合这条记录与注释可以看出,这里的“时行”等同于“疫疠”,即用“时行”直接指代疫疠,而记录中“时行”的主体并没有出现,根据上下文,这里的“时行”应该指代的是大范围流行的疫病,而并非贵族个人的疫病。

第二例的记录来自藤原道长的日记《御堂关日记》长和4年(1015)5月26日,因三条天皇御恼,故下令大赦天下,藤原资实拿来天皇诏书,并记录了诏书中的内容,“资实持来诏书草,文云:日来雾露相侵内,世间时行多闻者,大赦天下。”<sup>[6]</sup>根据这条记录,虽然这里的“时行疫”出现在藤原道长的日记中,但实际为摘录天皇诏书,因此,这里的“时行疫”实为天皇所述的大范围流行的疫病。

第三例的记录来自平安时代公卿藤原实资的日记《小右记》宽仁4年(1020)11月21日条,“近日往往时行发起云云,或合家死亡,或一乡悉烦云云。”<sup>[7]</sup>根据此条记载,近日常有疫病流行,或全家皆染病死亡,或一乡同染病。可以看出这里的“时行疫”指的是大范围流行的疫病,而并非个人的疫病。

以上三个事例的“时行疫”都是指大范围疫病的流行,而并非贵族的个人疫病,除此三例,其它“时行疫”出现的场合都指代贵族个人的疫病。

第二,通过表格的梳理也可以看到,在贵族个人的占卜中,对“时行”的判断常常很难确认,经常出现疑似“时行”,或几次判断出现不同结果的情况,可知“时行”的判断并非易事。如《御堂关日记》长和2年(1013)5月19日条,“早朝臣参东宫,有御恼气,似时行,依宜御座,入夜退出。是从明日依物忌也。”这里对藤原道长东宫的病症只是表示疑似时行。另有《小右记》长和5年(1016)5月19日条,藤原齐信心神不宁,经阴阳师安倍吉平的占卜为时行轻者,然而第二天,又将此病记录为“取时发烦,非时行云云”。除了由于难以判断导

致的几次占卜出现不同结果的情况,“时行疫”还时常与其他病症一同发病,如《小右记》永祚元年(989)6月23日条,“今朝太相府(藤原赖忠)恼给之由云云。仍参入,被命云,从昨夕有恼,仍令占,瘧病、时行、风热相克欤者,自明日可令行仁王经读经者。”根据这条记录,藤原忠赖近日身体抱恙,经阴阳寮的占卜乃瘧病、时行和风热三种病症相克所发,于是令行仁王经以消病。

第三,在“时行”的基础上,平安时代的日本贵族中还偶见“时行气”指代疫病的例子。如《贞信公抄》天历元年(947)8月18日条,“十八日,大内欲行御修法,而依御恼有时行气,俄改行御读经,僧数卅人,元廿一人,中宫御书云云,又夜间烦给者。”根据词条记录,因村上天皇出现“时行气”,所以将本要举行的御修法,改为行御读经。同样出现“时行气”的还有平安时代公卿藤原实资的日记《小右记》长和4年(1015)7月13日条,藤原实资的养子藤原资平近日身心所恼,怀疑是时行,经阴阳师安倍吉平所占,认为并非时行,而是邪气所致,然而第二日安倍吉平再次占卜,却出现了病因是时行的结果,“资平所恼非邪气,似时行,仍今朝以吉平,重令占其祟并平愈之期,占云:疫气也,平愈期今日以后甲乙丙丁日欤者。”这也引起了藤原实资的疑惑,“昨占灵气,今占疫气”。从这条记录可以看到,藤原资平的疫病经阴阳师安倍吉平的两次占卜,出现了不同的结果。第一次占卜的结果为“邪气”,第二次占卜的结果为“时行”,同时也可以看到在这条记录中将第二次占卜的结果又称为“疫气”。因此,可以推测在《小右记》记录的这一时期,“邪气”与“时行”是不同的病因,而“时行”又被称为“疫气”。

以上三点是根据《大日本古记录》中出现的“时行疫”的事例总结出的“时行疫”的特点。关于“时行”的含义,成书于11世纪初的日本史料《政事要略》中有所解释,“伤寒者,冬伤于寒即病者也。时气者,时行之病。春时应暖而反寒,夏时应热而反冷,秋时应凉而反热,冬时应寒而反温。非其时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病无长少,率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一名疫疠。”<sup>[8]</sup>从《政事要略》的解释来



看,“时行之气”,又名“疫疠”,是因四季时节不正而导致的具有流行性的疾病。

根据以上两节对古代日本“天行疫”和“时行疫”相关史料的分析,试将两者的特点总结如下:首先,从出现的时间上来看,“天行疫”集中在9世纪中期,而“时行疫”则集中在10世纪初至11世纪初期;其次,从史料的出处来看,记录“天行疫”的史料基本出自“六国史”,而记录“时行疫”的史料则基本为贵族日记;最后,从两种疫病观出现的情况来看,“天行疫”多出现在阴阳寮和神祇官为国家占卜而确定的疫病。而“时行疫”则更多出现在为贵族个人占卜而确定的疫病,但“时行疫”也偶有表示全国范围疫病的情况。

从日本“天行疫”和“时行疫”的特点来看,两者无论是在出现的时间、指代疫病的范围还是出现的情况都有一定的不同。那么,造成日本“天行疫”与“时行疫”差异性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解决这一疑问,还需要从探讨两者的文化来源开始。

### 3 日本“天行疫”“时行疫”的文化来源

根据上文所述,日本“天行疫”的疫病观出现在9世纪中期,“时行疫”则集中在10世纪初期至11世纪初期。然而中国方面,无论是对疫病的记载还是这两种疫病观的形成都远远早于日本,且对日本疫病观的形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关于疫病的记载,中国古时最早称为“疫”“疫疠”。东汉时期许慎所作《说文解字》有载,“疠者,恶疾也;疫者,民皆疾也”,可知“疠”为杀伤力大的疾病,“疫”则为具传染性的疾病。根据古代中国中医理论,将疫病分为温疫病和寒疫病,又称为温病和寒病。“瘟”字则为“温”的新造字,大致魏晋时期才在“温病”的基础上形成,等同于“疫”的含义,即具有传染性的疾病。此后,“瘟”与“疫”或单独成词,或两字结合成词,意指我们现在所指的瘟疫或疫病。

中国早期的“天行疫”观念,来自古代五行哲学思想中“天行气”的观念,同时,受到了天命思想的影响。最早关于“天行气”的记载来自东汉初期

成书的《白虎通德论》,“言行者,欲言为天行气之义也。地之承天,犹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其位卑,卑者亲事,故自周于一行,尊于天也。”<sup>[9]</sup>这里是把阴阳五行学说神学化,认为天地、阴阳、五行都是有意志的东西,而“天”占据最高地位,整个宇宙发展过程都是“天”的安排,这也是天命思想的体现。

在此之后,初期道教思想很快接受了“天行气”的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四时气”,东汉后期成书的道教太平道典籍《太平经》中有载,“故天行者与四时并力,天行气,四时亦行气,相与同心,故逆四时者,与天为怨”<sup>[10]</sup>,意为天行气与四时之节气是不可抗拒、不能违背的。《太平经》在天命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天行气”与“四时气”的不可抗拒性等同起来。

在东晋时期葛洪所著中医治疗学专著《肘后备急方》一书中,开始出现“时行疫”和“天行疫”的观念。该书对“时行疫”的解释为:“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耳,而源本小异,其冬月伤于寒,或疾行力作汗出得风冷,至夏发,名为伤寒。其冬月不甚寒,多暖气及西风,使人骨节缓惰受病,至春发,名为时行。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温病。如此诊候相似又贵胜雅言总名伤寒,世俗因号为时行,道术符刻言五温亦复殊,大归终止,是共途也。”<sup>[11]</sup>根据此书的解释可知,“伤寒”“时行”与“温疫”这三种病症因其发病特征相似,故可总称为“伤寒”。而世俗称之为“时行”,道家则称为“五温”,并分别解释了三种病症具体的发病起因。这则记录表现出早期中医学理论对疫病观的阐述,即认为疫病起源于伤寒,根源在于时节不正,因此疫病又可称为“时行”。同时,该书还在“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中论述了“天行疫疠”的病方,“辟天行疫疠雄黄丹”。可以看到,在东晋时代中医学经典中尽管出现了“时行疫”和“天行疫”,但对这两种疫病并没有严格地区别。

进入隋代,“天行疫”和“时行疫”的概念进一步被等同起来。隋代医学家巢元方所著《诸病源候论》在描述疫病时出现了“天行”的概念,并明确地将“时行”疫病与“天行”疫病等同起来,“时气病

者,是四时之间,忽有非节之气,如春时应暖而反寒,夏时应热而反冷,秋时应凉而反热,东时应寒而反温。其气伤人,为病亦头痛、壮热,大体与伤寒相似,无问长幼,其病形证略同。言此时通行此气,故名时气。世亦呼为天行。”<sup>[12]</sup>这条记载将“时行”疫病解释为受非节之气所染而得之病,并指出世间也称之为“天行”疫病。根据这条记载,“时行”与“天行”的含义可以互通,都指疫病。

隋代以后,历代中医学类著书中多见“天行”疫病的记载,其含义与“时行”疫病相同,意为由天地时节不正所生之病。唐朝孙思邈所著的中医学经典《备急千金方》对“天行瘟疫”的表述为:天无一岁不寒暑,人无一日不忧喜。故有天行瘟疫。病者,即天地变化之一气也,斯盖造化必然之理,不得无之,故圣人虽有天立极之德,而不能废之。虽不能废之,而能以道御之。<sup>[13]</sup>根据此记载,寒暑交替、忧喜交加乃常事,因此天行瘟疫,是天地变化的表现之一,天行瘟疫不能无之,但可以注意养生以及注重时节变化预防瘟疫。而对“时行瘟疫”,该书也有所论述:“时行瘟疫是毒病之气,而论治者不判伤寒与时行瘟疫为异气耳”(孙思邈,1994:318),意为“时行瘟疫”乃因异气而发的毒病。对于“异气”,该书后文解释为,异气是相对于正气的概念,“正气”是指一年四季时序正常,“春季温和,夏季暑热,秋季清凉,冬季冰冽”(孙思邈,1994:318),而异气则是四季时序非正常时所生之气,也是“时行瘟疫”发病的缘由。根据孙思邈《备急千金方》,我们可以在“天行瘟疫”中看到天命思想对古人疫病观的影响,同时也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对“天行瘟疫”和“时行瘟疫”并非进行了严格地区分,而是认为两者都是源于天地变化,即四季时序不正常而产生的异气所导致的疫病。

隋唐之后的中医药著书基本继承前代的疫病观,将“天行”和“时行”疫病的概念等同对待。宋代医学家郭雍所撰著作《伤寒补亡论》中讲到,“温病”或“温疫”,亦称“天行时行”,“一方一乡一家,皆同此病者,亦时行之寒疫也。大抵冬伤于寒,经时而后发者,有寒毒为之根,再感四时不正之气而病,则病安得不重。”<sup>[14]</sup>这则引文介绍了瘟疫的产

生与季节交替不正有关,再加上身体受寒的状况下,则有可能发生此类病症。该书在后文中对“天行”瘟疫做了解释,“四时皆有不正之气,春夏亦有寒凉时,秋冬亦有喧暑时。人感疫疠之气,故一岁之中,病无长幼,悉相似者,此则行之气,俗谓之,天行是也”(郭雍,1992:611),意思是四季皆有患疫病的可能,一年当中,无论长幼,如果患病的症状都比较相似的话,那么就是得了疫病,而疫病是由天行疫疠之气而产生的。明代王肯堂所编撰汉医学丛书《证治准绳》记载:“有一种天行瘟疫,热病,多发于春夏之间,沿门阖境相同者,此天地之疠气。”<sup>[15]</sup>这里的“天行瘟疫”也指的是由天地之间疠气所导致的瘟疫。

通过以上对古代中国“天行疫”和“时行疫”观念的梳理我们可以得知,东汉初期受到五行哲学和天命思想的影响,形成了“天行气”的思想观念。在此基础上,东汉中后期的初期道教思想将“天行气”与“四时气”等同起来,并强调两者的不可抗拒性。至东晋时期,中医学理论进一步将“天行疫”和“时行疫”解释为因时节不正而引发的流行性疾病,然而最迟在隋代的中医学理论中两者所指代的意义已基本等同。同时,还可以看到古代中国“天行疫”和“时行疫”的观念既可以表示大范围的疫病流行,也可以用来指代个人的疫病。综上所述,中国的“天行疫”和“时行疫”的观念是融合了五行哲学、天命思想、道教思想以及中医学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疫病观。

根据上文对中日两国“天行疫”和“时行疫”疫病观的梳理,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考虑。

首先,日本的“天行疫”和“时行疫”观念来源于中国。第一,从时间上来看,日本的“天行疫”和“时行疫”的观念分别形成于9世纪中期和10世纪初期,而中国的“天行疫”“时行疫”观念是在吸收了五行哲学和天命思想的基础上,经过东汉初期道教思想的影响,于东晋时期出现在中医学理论中的。日本“天行疫”和“时行疫”观念形成的时间要远远晚于中国。

第二,从思想来源上来看,日本“时行疫”和“天行疫”的疫病观多出现在阴阳寮或神祇官的占

卜过程中,平安时代阴阳寮负责占卜、天文以及时历的编纂工作,其中天象观测也是阴阳寮的工作之一,而阴阳寮工作所需要的技术和知识主要来源于中国古代五行和阴阳思想。自推古朝10年(602),百济僧观勒上贡历本及天文、地理、遁甲、方术之书起,日本就通过传入的书籍学习中国的五行和阴阳思想以及中医学知识。而日本对中国天命思想的吸收则源于对律令制度的吸收。在《日本书纪》、《续日本纪》等有关天灾地异的记载诏书中,使用“天地谴责”“天示星异,地显震动”等字样是极为常见的。<sup>[16]</sup>

第三,从传播途径上来看,根据9世纪后期日本所藏中国书籍目录,由藤原佐世编纂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医方家”一卷记载了平安时期传入日本的中国中医学书籍,其中就包括对“天行”“时行”疫病观有所记载的《诸病源候论》。除此之外,中日两国的史料中关于“天行疫”和“时行疫”的记载出现了类似的论述。例如平安时代的文献《政事要略》对“时行疫”有这样的解释,“伤寒者,冬伤于寒即病者也。时气者,时行之病。春时应暖而反寒,夏时应热而反冷,秋时应凉而反热,冬时应寒而反温。非其时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病无长少,率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一名疫疠。”(黑板胜美,1964:701)将之与中国宋代中医学典籍《伤寒补亡论》中对“天行疫”的论述对比,“四时皆有不正之气,春夏亦有寒凉时,秋冬亦有暄暑时。人感疫疠之气,故一岁之中,病无长幼,悉相似者,此则行之气,俗谓之,天行是也”(郭雍,1992:611),发现两者的论述几乎一致。唯一不同的是日本将中国对“天行疫”的解释替换为了“时行疫”。据此,可以看出10世纪之后,日本吸取了古代中国中医学理论中的疫病观,但摒弃了其中“天行疫”的概念,而将之替换为“时行疫”,这也反映出10世纪之后日本社会对天命思想的刻意排除。

因此,从两种疫病观出现的时间、思想来源以及传播途径上来看,可以确定的是初期日本“天行疫”和“时行疫”的疫病观应该是直接受到了中国疫病观的影响。

另外,从日本吸收中国“天行疫”和“时行疫”

观念的特点来看。根据上文所述,中国的“天行疫”和“时行疫”观念是在融合了五行哲学、天命思想、道教思想和中医学理论的基础上于东晋时期形成的,两者几乎同一时期形成,至迟于隋代时期在概念上已经等同,且两种疫病观在疫病的范围上并无特别针对性,在中医学论著中多呈现混用的例子。而日本在吸取中国疫病观时,对于同一概念的疫病观却采取了区别性地对待,在9世纪中期先吸收了“天行疫”的观念,并于10世纪初摒弃了这种疫病观进而形成了“时行疫”的观念。对于在吸收古代中国疫病观时出现的这种有选择性、区别性吸收的特点,笔者认为,这是因为日本在吸取“天行疫”观念时,摒弃了与“时行疫”同一概念下的“天行疫”,而选择性地吸取了萌芽时期在五行哲学、天命思想影响下形成的“天行气”的阶段,即认为疫病观的产生源于“天”的安排。

然而,9世纪中期日本的“天行疫”观念又不完全等同于古代中国“天行疫”萌芽阶段“天行气”的观念。日本的“天行疫”观念中,疫病产生的根源不是“天”而是“神”。松本卓哉在关于古代日本对中国灾异思想吸收情况的研究中指出,律令时期日本吸收了中国天命思想和灾异思想的同时,没有全部将灾异产生的具体责任归于天皇和臣子,而是将之转移为神灵作祟,认为灾异产生的原因来自对神灵的不敬,因此需要用敬神的方式消除灾异。<sup>[17]</sup>小林宣彦在从古代日本灾异情况看日本对中国天命思想的研究中进一步提出,奈良时代,日本常见吸收中国天命思想的例子,然而与中国方面由皇帝亲自向上天祈求不同,对于日本的天皇是否亲自参与了祝愿活动这一点尚且无法确定,而日本方面祝愿的对象也并不是“天”,而是“神祇”(小林宣彦,2019:89)。总结两学者的论断,日本对中国天命思想和灾异思想的吸收并不是全面的,而是进行了“日本化”的改造,两者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两点:一,中国方面灾异发生的原因是统治者的不德,日本方面则将责任转移为神灵作祟;二,中国方面为应对灾异举行的祭祀,其对象是“天”,日本方面则将祭祀对象设定为“神灵”。根据日本对中国灾异思想的这种特点,笔者



认为,日本9世纪中期的“天行疫”观念,是在古代中国“天行疫”萌芽阶段“天行气”观念的基础上,将“行疫”的主体由“天”转变为“神”。因此,出现了阴阳寮占卜“天行疫”后,朝廷采取的是祈求神佛的宗教措施这一现象。

“天行疫”观念之后出现的“时行疫”,则继承了古代中国中医学理论的疫病观,认为“时行疫”的产生源于四季气候的反常,这一点可以从《政事要略》中对“时行疫”的解释上看出,“伤寒者,冬伤于寒即病者也。时气者,时行之病。春时应暖而反寒,夏时应热而反冷,秋时应凉而反热,冬时应寒而反温。非其时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病无老少,率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一名疫疠。”(黑板胜美,1964:701)

综上所述,日本“天行疫”和“时行疫”的疫病观来源于中国,并受到中国疫病观的影响。日本“天行疫”的观念初期受到中国五行哲学和天命思想中“天行气”观念的影响,并有选择性地吸收了中国天命思想中“天行”的部分,将灾异形成的原因归结为“神”;而随着平安中期日本对中国天命思想的逐步排除,“天行疫”的观念不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流行在贵族之间的“时行疫”的观念,这种疫病观明显受到中国中医学观念的影响。

#### 4 结 语

本文的考察对象是古代日本“天行疫”和“时行疫”的两种疫病观。通过对平安时代史料中关于这两种疫病观相关记载的梳理,笔者发现古代日本“天行疫”和“时行疫”的观念存在差异性,两者在出现时间上存在前后继承的关系,在相关记

载史料上存在日本国史和贵族个人日记的差异,而在指代的疫病范围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通过对古代中国“天行疫”和“时行疫”观念的梳理,笔者进一步发现日本“天行疫”和“时行疫”这两种疫病观差异性地的形成,与日本吸收中国疫病观的特点有关。日本“天行疫”和“时行疫”的观念是在吸收中国疫病观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日本对中国“天行疫”“时行疫”的吸收是有选择、区别对待的。9世纪中期,日本选择性、区别性地吸收了中国“天行疫”萌芽阶段“天行气”的观念,并在“崇神”的日本灾异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不同于中国的“天行疫”的观念;10世纪,出于对“天行疫”观念中天命思想的抵触,日本摒弃了“天行疫”的观念,而通过对中国中医学理论的吸收,从中提取了“时行疫”的观念。这种对中国疫病观有选择性、区别性的吸收过程,也使得日本“天行疫”和“时行疫”观念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的差异性。

通过本文的考察,基本阐明古代日本“天行疫”和“时行疫”观念的形成、发展、特性及其文化来源。然而,对于日本“天行疫”和“时行疫”出现差异性的原因,仍有探讨的空间,如10世纪日本贵族对“时行疫”观念的吸收,应该与日本佛教从奈良时代以镇护国家为目的向平安时代以镇护贵族和天皇个人为目的的发展特点有关。除此之外,关于古代日本对于疫病的认识,还需要进一步将为应对疫病所举行的宗教仪礼纳入研究视野,关于这两点,笔者将另行撰文叙述。

[本文为2020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立项“东亚视域下的古代日本禳疫仪礼研究(8-12世纪)”(课题编号:20JDZD019)。课题负责人:姚琼]

#### 注

- [1] 經濟雜誌社. 国史大系・続日本後紀[M]. 東京: 經濟出版社, 1897: 309.
- [2] 經濟雜誌社. 国史大系・日本三代実録[M]. 東京: 經濟出版社, 1904: 126.
- [3] 小林宣彦. 律令国家の祭祀と災異[M]. 東京: 吉川弘文館, 2019: 13.
- [4] 經濟雜誌社. 国史大系・続日本紀[M]. 東京: 經濟出版社, 1897: 287.
- [5] 藤原忠平. 大日本古記録・貞信公記抄[M]. 東京: 岩波書店, 1956: 16.
- [6] 藤原道長. 大日本古記録・御關堂日記[M]. 東京: 岩波書店, 1954: 224.
- [7] 藤原実資. 大日本古記録・小右記[M]. 東京: 岩波書店, 1967: 181.



- [8] 黑板勝美. 国史大系·政事要略[M]. 東京: 吉川弘文館, 1964: 701.
- [9] 班固. 白虎通德论[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26.
- [10] 罗炽主编. 太平经注译上[M].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273.
- [11] (晋)葛洪, 王均宁点校. 肘后备急方[M]. 天津: 天津科学出版社, 2005: 45-46.
- [12] (隋)巢元方. 诸病源候论[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55: 245.
- [13] (唐)孙思邈. 备急千金方[M]. 长春: 吉林出版社, 1994: 317.
- [14] (宋)郭雍. 伤寒补亡论[M]. 北京: 中国书店, 1992: 607.
- [15] (明)王肯堂. 证治准绳[M]. 上海: 上海科技出版社, 1969: 56-57.
- [16] 刘晓峰. 日本冬至考——兼论中国古代天命思想对日本的影响[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3).
- [17] 小松卓哉. 律令国家における災異思想—その政治批判の要素の分析[C]//古代王権と祭儀. 吉川弘文館, 1990.

#### 参考文献

- 李泽厚. 新版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1.
- 小山聡子. 撰関期の疫病治療—禁忌とされてきた加持と修法を巡って—[J]. 日本仏教総合研究, 2016(5).

---

作者简介: 姚琼(1988—)女 汉族 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 古代日本民俗信仰研究  
联系方式: yaoqiong382@163.com

## The Impact of an Ancient Chinese Epidemic Concept on Japan

**Abstract:** In ancient Japan, two concepts coexisted to describe the origin of epidemics: "natural epidemic" and "current epidemic". There were certain differences in the time of emergence and the scope of the epidemic in each case.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epidemic concepts in ancient Japan are related to the way of absorbing the ancient Chinese epidemic concept. The concepts of "natural epidemic" and "current epidemic" in Japan are formed on the basis of absorbing the concepts of "natural epidemic" and "current epidemic" in China. However, the concept of "natural epidemic" in Japan is not absorbed completely, but selectively and differently, and incorporated the ideas of disaster in Japan. This is also the reason for the difference in the formation of "natural epidemic" and "current epidemic" in Japan.

**Keywords:** Japan; natural epidemic; current epidemic; Destiny Thought; Disaster Thinking

#### Author's Information:

Yao Qiong (Female) Year of Birth: 1988  
Lecturer at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China  
Comparative Culture  
E-mail: yaoqiong382@163.com